

壹、前言

大學教育是人才培育的重要階段，大學入學制度不僅決定高中教育的方向，也被視為社會資源分配的重要環節。國內外的研究都顯示，大學學歷和高中職以下學歷的勞工在薪資與工作穩定度上有明顯的差別（郭姿伶，2008；McCall, 2000; Paulsen, 1998）。因此，大學入學制度與大學教育機會分配的關係一直都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我國在2002年以包括「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學校「推薦甄選」與「個人申請」等管道的多元入學方案，取代實施長達48年的大學聯招制度。實施多元入學的目標，除了要讓各大學校系能夠招收到更為適才適所的學生外，還希望導正過去高中教學只注重升學考試的弊端，引導學生透過自我學習和課外活動經驗，發展與社會環境互動的關係（秦夢群，2004）。可是，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以來，常被貼上「多錢」入學的負面標籤。例如：某國立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曾經表示，推甄制度對窮苦弱勢的學生比較不利，主張保留較多的名額給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王彩鸞，2012a）。但是，這樣的印象真的符合實際的狀況嗎？本文要探討的問題之一，就是考試分發入學相較於多元入學的其他管道，是否真的比較不會受到考生家庭背景的影響？

至於本文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則是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所提供的垂直社會流動機會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由於這個問題必須比較不同入學管道和不同國家的入學制度所提供的垂直社會流動機會的高低，在無法進行跨國調查的限制下，針對個別大學的個案研究比較適合用來探討入學制度改變前後、或是同一時期透過不同管道入學的學生來源背景差異。本文將焦點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入學制度的演變，以及這三所大學學生來源集中於明星高中程度的分析。這三所大學長期以來一直是兩國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頂端，也是中上階層家庭和菁英階級積極爭取其子女進入就讀，藉以累積文化資本的首選志願。這些頂尖大學提供的社會流動機會雖然不同於整體的社會流動程度，卻最能真切反映不同的學校如何在追求卓越的同時，兼顧社會正義的目標。